字迹尽行查获”；嗣后，再怎样“于三十日抵署，即知会学臣汪永锡，并在省司道及委查书局各官，”将王锡侯“家内及伊子寓所先后查获各书公同细看”，检出“应毁书九种”。于是，就又给王锡侯横加了“有心藏匿”“违碍书籍”，“屡犯御名”，“诗语狂悖”、“语有牢骚”等罪名，并且进而将祸水引向在职侍郎李友棠、已故大学士史贻直和钱陈群等多人⑭。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所有这些倒行逆施，又哪里有半点“纵庇”之意呢？

综观《字贯》全案，海成既不可能纵庇王锡侯，也确实没有纵庇王锡侯。因此，《清史稿》所称“海成以纵庇王锡侯褫职”之说，理所当然不能成立了。搜缴“违碍”书籍之初，清高宗集注意力于“明季诸人书籍。”他说：“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抵触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⑮《字贯》案发前一年，他还说过：“明季诸人书籍，词意抵毁本朝者，自当在销毁之列。”⑯到乾隆四十二年《字贯》案发生，才使之大为震恐，原来竟有“现在刊行”的“违碍”书籍。于是，将禁书范围扩及“现在刊行者”。他明谕：“朕令各督抚查办应行销毁书籍，原因书内或有悖逆狂诞者，不可存留于世，以除邪说而正人心。是以旧人著作尚且应查，岂有现在刊行者转置不问之理。”⑰既然《字贯》一书开“现行刊行”的“违碍”书籍风气之先，而海成又不能尽心揣度清高宗禁书的苦衷，高宗自然就不惜以之为牺牲了。显然，这才是海成丢官的真相。

---

①《清高宗实录》卷1022。

②⑬《清高宗实录》卷1044。

③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575页。

④⑤⑥⑦⑭《故宫掌故丛编》第一辑，《王锡侯字贯案》。

⑧⑨⑩⑪⑫⑰《清高宗实录》卷1043。

⑮《清高宗实录》卷964。

⑯《清高宗实录》卷1021。

清史研究评介

一部有裨清史研究的目录学著作

——评介《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

顾真　　夏至

来新夏同志所著《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出版了。这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目录学专著，又是一部有裨清史和近代史研究的工具书。全书共分六卷，实际上由两大部分组成。卷一至卷五是作者经眼所见八百余种清人（包括仅卒于清或仅生于清者）年谱的书录，这一部分构成了该书的主要内容。卷六著录了见载于他书或传闻自他人而为作者所未亲见的年谱一百四十余种，另有谱名，谱主索引两种，作为该书的附录。作者长期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和京、津，沪、宁等地一些大图书馆中搜览年谱，每读一谱，辄作书录一篇，凡涉诸清人

年谱八百多种，一千二百余卷，成书录八百余篇，方辑为一书。是书前后三易其稿，中途又经成稿的散佚，多所周折，计从作者创意发凡至属稿付梓，历时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现在终于亭立在茂密的书林中，同读者见面了，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本书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是值得称道的。

首先，它给读者提供的知识内容具有较高的准确可靠性。我们知道，对于一部目录学和工具书的根本性要求，是它的准确可靠性。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取得读者的信任，从而放心地去采用它，否则，错误百出，读者不敢使用，这样的工具书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因此，一部好的目录学著作，最忌讳东拼西凑因袭同类读物，转加介绍。来著《知见录》，由于是作者亲自披览原著所写的书录，因此，不仅所记内容相当准确、可靠，不至以讹传讹，而且还对前人同类著作的有关错误，间出按语考辨，多所指正。其中有纠谱名之误者，如孙振烈自编《次皙次斋主人年谱》，杭州大学图书馆《中国历代人物年谱集目》误题《次皙自定次斋主人年谱》（第２５４页）；有纠谱主生年之误者，如清王其慎编《质斋先生年谱》，李士涛《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误著谱主嘉庆二十年（１８１５）生，实为嘉庆二十一年生（第２０８页）；有纠谱主卒年之误者，如严辰自编《桐溪达叟自编年谱》，陈乃乾《共读楼所著年谱目》著谱主光绪十四年卒，实则彼乃谱主止笔之年（第２１６页）；有纠谱主得年之误者，如罗正钧编《左文襄公年谱》，汪訚《馆藏历代名人年谱集目》著谱主得年七十岁，实际上应作七十四岁（第２０４页）；有卒年误而致得年亦误者，如英和自编《恩福堂年谱》，梁廷灿《年谱考略》著谱主卒于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８），得年六十九，其实这是谱主止笔之年，谱主实得年七十岁(第１４８页)；有纠刊本之误者，如《十年读书之庐主人自叙年谱》，李士涛《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著有《思补过斋主人年谱》刻本，实际上那是谱主李钟文之父基源自叙年谱，非李钟文自叙之另刻本（第２０６页）；有纠撰人之误者，如《吴公年谱》，未著撰人，李士涛《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误题吴受福编，实际上撰人乃谱主之子吴泰阶，吴受福仅稍补行事而已（第１１１页）；有纠著录之误者，如《毛大可自订年谱》，李士涛《中国历代年谱目录》、杭州大学图书馆《中国历代人物年谱集目》，均谓收于《西河合集》，来检诏书，并无此谱，遂置列入《知而未见录》并指出李录与杭目之误。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这些辨误，大大提高了来著《知见录》的准确可靠程度。

其次，著录内容丰富翔实。来著《知见录》所做书录八百余篇，加上《知而未见录》一百四十余篇，二者合在一起，殆近千篇，仅清人年谱即著录如此之多，内容堪称宏富。在所有这些书录中，除了一般标名“年谱”者外，还有校书谱、诗谱、图谱、纪年诗、年表、合谱、专谱等特种“年谱”。由于作者的辛勤搜寻，发现了前人未加著录的清人年谱稿本，如王汉章编《谵归大师年谱》（第３０３页），抄本如陈锡麟自编、陈鸿保续编《陈锡麟年谱》（第２０７页），传抄本如清林聪彝编《文忠公年谱草稿》（第１６１页），油印本如王焕镳编《陶文毅公年谱》（第１５４页），等等，悉加著录。得之友朋传说而未见之稿本，如俞寰澄编《戴子高年谱》亦阑入所附“知而未见录”中。在著录内容方面，过去的目录或仅列谱名、撰者，或酌收谱主生、卒年与得年。来著不仅准确地记录了上述项目，而且对谱主事略、编谱缘起与史料价值等也作了较为恰如其分的说明，从而大大丰富了本书的著录内容。

其三，比较恰当地评论了的著录年谱的史料价值。给年谱写书录，除了它本身在目录学上的意义以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说明年谱的史料价值，以便读者选择浏览。特别是史

部目录学著作，其对能著书籍史料价值的论述是否得当，更是评价它优劣的重要准绳之一。在这方面，来著也是基本成功的。作者往往用寥寥数语点出该谱中所涉及到有关清代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历史问题的有史料价值的记载，为研究者提供了有用的线索。如侯堠《（觉罗诗人）永忠年谱》书录云：“谱主为清宗室中诗人，与敦诚、曹雪芹等均有交往，谱中曾引录其吊曹之诗”。“是谱及谱主著作如《延芬室全集残稿》及《瑶华手札》等，对于研究《红楼梦》有可供参考之处。”（第１１０页）又如清宝琳、宝询《昇勤直公年谱》书录云：“是谱系谱主之子据其见闻纂辑，记仕历极详，并引录有关文件，惟谱以谱主一生主要仕历多涉八旗事务，记述旗务问题为多，可供研究八旗历史之参考。”（第１３７页）再如张謇《啬翁自订年谱》书录云：“是谱于研究中国民族资本企业之发展及民族资产阶级之性格与形成，尚有裨助。”（第２６３页）对一些不足凭据的材料，书录也酌加抉出，如金鹤冲编《钱牧斋先生年谱》书录云：“是谱乃编者有意为谱主降清一事辩解而作，……固不足称信史”。（第２页）又如张敬立撰《是仲明先生年谱》，美化谱主为学问家和道德上的完人，作者据《茶余客话》、《东皋杂钞》、《石翁山房札记》等书斥其“曲讳”不实，进而指出“使用年谱资料，又不可不慎”(第８６页)。对其他目录书于某些年谱评价不当者，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如潘世恩自编《思补老人手订年谱》，《鸦片战争书目解题》谓其“记于殊略，然亦足资参考”。来著以为潘在鸦片战争中属从投降派，对战时政事一无所叙，是书并无史料价值可言，《解题》之论“不足凭信”（第１４７页）。

年谱中一些不经见的史料，来著则择要录出。如陆模自编《朝议公年谱》，于道光三年条记江苏水灾，难民反抗，谱主以乡绅身份献策镇压的资料。罗惇衍自编《罗文恪公年谱》，于咸丰五年条所录论厘金流弊疏等，皆为当时第一手资料，书录中酌为捡出数行，为读者进一步研究有关问题，提出了较为具体的参考资料和查找线索。

来著能在著录时作出以上科学的处理和公允的评论，是与作者本身的学识水平有关的。此前作者曾出过颇有一定份量的年谱专著和目录学理论著作，为本书的著作积累了深厚的功底。加之作者知识面广，涉猎的载籍多，能互相比较参证，从而得出较为中肯的结论。如评俞正燮编《何端简公年谱》，揭出俞尚撰有《何端简父子事迹》一文（收入《癸已存稿》），可互相参考（第７５页）。又如论沈曰富《沈端恪公年谱》与俞樾《春在堂随笔》卷５，所载有关资料参征，对该谱版本发表了见解（第７７—７８页）。所有这些都只有在博览群籍的基础上，才在评点时做到深中肯綮，游刃有余。

其四，检索方便。作者在《代序》与《后记》中，一再表明撰书主旨乃在于为了节省他人搜检资料的烦劳，甘愿做“铺路石子”的工作。因此，全书的编排，充分体现了作者方便读者的用心。是书正文依谱主生活年代划分为五类：即明清之际人物，顺治、康熙、雍正时人物，乾隆时期人物，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时期人物，生于清而卒于辛亥革命以后人物，每类各为一卷。这样从某个人物的生活时代便可以找到他的年谱著录。每篇书录，皆按照谱名、刊本、著录情况、谱主事略、史料价值、编谱情况，藏者等项顺序著录，使读者翻检时一目了然。特别方便读者的是书后所附谱主索引和谱名索引。前者按姓氏笔划排列，于姓名后括注生卒年，后者按书名笔划排列，于书名后括附谱主姓名。有了这样两个索引，读者检索起来按图索骥，非常方便。

总而言之，来著是一部著录准确，内容充实，评论中肯，使用方便的清史史部目录学专著。它为近三百年的七、八百个历史人物提供了基本的生平史料，也为研究近三百年历史提供了若干值得珍贵的资料线索。这对于清代和近代人物与社会历史的研究，无疑是有积极意

义的。

当然，来著也并非十全十美，还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如书名中“近三百年”的时间概念与实际所收人物的范围的吻合问题，还可再作推敲。“知而未见录”部分尚望在再版时能并成“知见录”；一些未加著录的重要人物的重要年谱，亦待增补。在现有著录中，也有若干失误或欠妥之处。如《方望溪年谱》云方苞为“安庆府桐城县人”应加注寄籍上元，因作者对其他房籍情况是作了说明，此处亦应体例一致。又如本条云及方苞因《南山集》案罚入汉军旗籍，后“赦归原籍 ”（第76页）。此处句意欠明，易给人赦还原籍老家的错觉，实则是赦方氏出旗籍，并非回老家。又如《尹左夫人年谱》，尹氏既不为人所知，是谱既为其子所作，若对其子酌加介绍，当有助于了解该书。再如，《傅青主先生谱略》书录中已辨谱主卒年应以后人考订之“清康熙二十四年卒之说为是”，而于另一处《傅青主先生年谱》书录介绍谱主事略时却采用了“清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卒”的说法（第１５页），是前后抵牾。所有以上这些都是一些技节性的问题，暇不掩瑜，我们提出来，希望再版时能得到纠正。

最后，我们祝愿继来著《知见录》以后，有更多的同类著作问世，以至象本书作者所提议的那样：“对史籍的每个门类或小目类都有人分别去清查一下底数，并把结果写出报告，编制一些工具书。”这不仅是少数人为多数人摆好“梯子”的工作，而且是造福学林的千秋事业。

战后日本学者研究清入关前史概况

冯　年　臻

一、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的新成果

战后，日本学者对清入关前史的研究，首先从文献方面入手，对清前史料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其中以《明实录抄》、《李朝实录抄》、罗马注音译《满文老档》最为著称。

《明实录》和《李朝实录》中的“满蒙史料”的抄录工作，早在１９３３年即已开始。前者是由三田村泰助、今西春秋担任，后者的抄录由旗田巍承担。两部实录的抄本，直到１９５４年才开始陆续出版，至１９５９年前者１８册、后者１５册全部出完，

文献整理的另一项突出成绩，是神田信夫、松村润、罔田英弘的《满文老档》罗马注音日译本的出版（东京，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６３年）。１９６９年，神田等人又将《满文老档》乾隆整理本的缺少部分，即台湾出版的《旧满洲档》第９册（天聪９年）译注出版。

在文献研究方面，今西春秋从１９５８年起至１９７３年的十多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就发表了以《满文老档的目录》、《标注战绩舆图索引》、《满文武皇帝实录的原典》等为题的撰辑，达１５篇之多。这无疑对清前史研究工作的进展，具有较大的裨益。

三田村泰助的突出贡献，是把《满文老档》与《清太祖实录》进行比较研究。通过二者的比较，列举了《实录》的种种溢美之词和舛误之处。文章分析细致，具有较高的学术的水